

吸取五十年代人口问题论战的教训 认识我国控制人口的战略任务

程 度

切实控制人口增长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回顾一下我国五十年代后期，在人口问题上的一场论战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完成控制人口的任务是大有好处的。

五十年代后期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战，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在历史转变中的必然产物。我们知道，旧中国人口再生产的特点是，高出生率（38.9%），高死亡率（27.6%），低自然增长率（11.3%）；近百年来，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解放前夕，每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则更低（2.6%左右）。解放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九五三年六月公布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人口已超过六亿。同年，内务部根据对29个大中城市及个别省、县、区、镇、乡、村的调查得出，我国人口出生率为37%，死亡率为17%，自然增长率为20%。实际上，人口增长率比上述统计数字还高。就上海市而言，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30%以上。就全国而言，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的八年中，每年增长也在22%左右。可以这样说，解放后，人口再生产的特点，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正因为人口的基数大，增长速度快，所以引起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关切和重视。毛主席指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党和政府也多次发出指示，要“适当地节制生育”。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学术理论界都对我国人口问题展开了研究。到一九五七年，在人口理论的讨论中，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诸如怎样对待六亿以上的人口，是认为人愈多愈好，让人口高速增长，还是让其低速增长，实行控制？人作为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怎样？人口与劳动生产率和就业问题的关系如何？人口与农业的关系如何？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有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是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主张要控制人口；一是主张人愈多愈好，认为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主要是发展生产，而不是节制生育。

实践证明，“新人口论”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当时这场论战没有正常进行下去。一九五七年夏季以后就开始了批判所谓马尔萨斯主义，并且是把它当作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政治阴谋来对待的。紧接着发动的批判“新人口论”的两次高潮，亦是把它当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问题来处理的。因而人口理论的研究，一开始，就把一方视为“异端邪说”，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气氛之下，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真理越辩越明！？从而造成了严重后果。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生搬硬套外国的人口规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表述，只能适用于他们的情况，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但是主张“人愈多愈好”者却据以论述我国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认为人口不断迅速增加，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实质。“我国目前人口迅速增长，就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作用的结果。”既然人口迅速增长是我国社会主义

的人口规律,那我国人口迅速增长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不是十分明显地在为我国人口的高速增长制造理论依据吗?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都说明,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在这种错误的人口规律理论指导之下,使我国长期承受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严重后果。

2. 搅乱了人口理论的是非。对于我国的人口理论,毛主席有精辟的论述,他充分肯定了我国人口众多的好处,同时又指出了人多带来的困难,要控制人口的高速增长。毛主席说:“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①毛主席总是一分为二的对待我国的人口问题的。可是在五十年代后期的人口论战中,主张“人愈多愈好”者却把我国的人口理论引导到错误的轨道。全国各种报刊长达数年的理论围攻与片面宣传,造成举国上下只讲人多是好,只知人多是好事的假象。既然人多是好,那就用不着重视控制人口,计划生育了。当时有人就不同意对“新人口论”的批判,曾尖锐指出:“这篇文章(指“新人口论”——引者)基本上是健康的,正确的,是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对于在广大群众中开展节育宣传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认为他的观点实质上就是和马尔萨斯的观点一样,这种说法未免有些不够公正,同时也容易引起人们的一些错觉。好像凡是提倡节育者,就是马尔萨斯主义者,这自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②

3. 阻碍了正确的人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张“人愈多愈好”者是不提倡节制生育的,有时口头上讲讲,却并不付诸实际行动。无怪,他们尽管发表了成百篇批判文章,却始终拿不出像样的政策来。在这种错误观点影响下,我们长时期没有制定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措施,而使人口政策始终停留在“适当地节制生育”的阶段上。

由于以上三方面的影响,我们国家的人口生育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致使人口达到九亿。

与“人愈多愈好论”者相反,“新人口论”者研究人口理论的目的很明确,他们就是要为国家制定正确人口政策提供依据,并且提出自己关于节制生育措施的意见,比如他们主张:

1. 国家要掌握人口增长的动态,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人口政策,在国民经济计划中要列入人口增长计划。

2. 要广泛宣传节制生育的必要性,严格控制人口,提倡晚婚、晚育,国家应有干预生育、控制人口之权。

3. 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控制人口增长的关键是控制人口出生率。要把人口出生率从37‰降到17‰,使自然增长率维持在5‰左右。有的人甚至进一步提出:“东德人口大约控制在平均每个家庭只有2.7人口的先例。”^③

这些节制生育的意见是针对当时人口高速增长而提出的正确而又可行的措施。如果当时冷静地对待他们的建议,采纳他们的主张,我国的人口不至于达到今天的地步。到了今天,我们重读他们的主张,“仍感到甚至更感到它的直接现实意义。”^④

我们今天面临着人口达到九亿的现实,这个庞大的人口现实,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能在此基础上来研究解决人口的政策措施,而不能在任何别的基础上来完成控制人口的战略任务。党和国家为此已提出了要把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一九

七八年的12%降低到一九八五年的5%左右，争取到二〇〇〇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零。如果达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的境地，可以说就完成了控制人口的战略任务。现在我们来分析达到这个战略目标的一些问题。

1. 我国人口可能稳定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现在拟定的人口政策措施是：“晚婚，晚育，少生，”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坚决杜绝三胎；鼓励只生一个孩子，惩罚超生三个孩子。在这种条件下，今后数年，每年平均出生的人口数将在1,000万人至2,000万人之间波动，因为从现在起进入婚育年龄的男女青年是在一九五四年以后出生的，按人口出生率37%计算，今后十年内，每年平均约有1,000万对婚育龄夫妇。若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十年就有一亿人出生，若生两个，就有二亿人。按生育法，生两个孩子并不违法，若平均每对夫妇生1.5个，每年出生人口约为1,500万人；同期内，人口死亡率如果按7%计算^⑤，每年净增人口800万人，十年就8,000万人。再一个十年（即一九八九——一九九九年）净增人口最少有4,000万人。一九七九年——一九九九年的二十年内人口净增可能达到1.2亿人。这样看来，到了二〇〇〇年我国人口可能在11亿的基础上稳定下来。

2. 达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的战略目标，人口出生将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我国现在还没有达到婚育的最高峰期，仅是最高峰的起始点，生育的最高峰当在一九八七年以后。因为我国人口历史上生育的最高峰期，出现在六十年代的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一年这十来年时间。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每年出生人口在2,700—2,950万之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六年时间，净增了1.22亿人口。每年净增2,000万，折合成出生人口每年也在2,800万左右。由此可见，在一九八九年以后的十年，每年至少有1,400万对婚育龄夫妇，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每年也要增加1,400万人口，如果那时的死亡率，仍保持目前6—7%左右，则每年净增700万人口，如果死亡率提高到10%，每年净增也有400万人。这样看来，达到二〇〇〇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零的目标是非常艰巨的。如果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百分之百的实现，每年至少还得净增400—700万人。如果要达到二〇〇〇年人口不增不减的目标，则每对育龄夫妇就不能生一个孩子，而只能生0.7—0.5个孩子^⑥，即十对育龄夫妇只能生5个或7个孩子，每个家庭平均只能有2.5—2.7人。所以，每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将来还可能根据情况发生变化。

今后的二十年是我们完成控制人口的战略任务的关键时期，又是人口生育的最高峰时期，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解决好这一矛盾，必须：

1. 吸取沉痛历史教训，切实加强党的领导。要书记动手，全党全民动员，切实抓好计划生育。否则领导一放松，每年增加两三千万人口的历史，很容易重演。

2. 慎重宣传人口政策，不能留下人口增长的缺口。计划生育法试行草案，规定最好一个、最多两个，限制超生三个孩子。现在报刊宣传已改为只生一个孩子，可是在基层单位的宣传上，仍然停留在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孩子上。这两种提法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如果只生一个，今后数年内出生人口在1,200—1,400万之间波动；如果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则出生人口就在1,200—2,800万之间波动。后者，显然增长过多，不符合控制人口的战略要求。因而，我们宣传的着重点应该及时转到只生一个孩子上面来。

3. 及早公布生育法,使人口生育依法进行,依法奖惩,奖惩兑现,取信于民。否则,全国人民不按生育法办事,那控制人口的战略任务就很难如期实现了。

注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7、469、471页。

② 顾利仁:《我对新人口论的几点看法》,《光明日报》1958年6月11日。

③ 上述三点主张,系根据马寅初《新人口论》;吴景超:《中国人口问题新论》和钟惠兰:《必须有计划地节制生育》综合。

④ 陈中立:《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平反》,《人民日报》1979年7月13日。

⑤ 黄雪林:《我国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建设》,《江汉论坛》1979年2期。

⑥ 不增不减,即人口出生数等于死亡数。死亡率为6—7%时估计有七百万人死亡,死亡率为10%时,有一千万人死亡。则出生人口在700万人/1400万对夫妇——1,000万人/1,400万对夫妇。即0.5—0.7人。

(上接第20页)由于美国总统卡特在去年十月底宣布了一整套挽救美元的紧急措施,使市场对美元一度恢复了信心,美元汇价大幅上扬,到今年五月,美元对日元比去年十月底的最低价回升了28%。但是,六月下旬以来,由于受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美元又开始回跌。

目前,在石油危机冲击西方经济的情势下,黄金再次成为投机的对象。石油加价加剧西方经济的“滞胀”,各种货币相对于黄金来说都为之失色。因此,西方市场出现抢购黄金的风潮,黄金价格一跃再跃,急剧上涨。九月十八日,金价涨至1盎司382.5美元的高峰,比年初金价1盎司224美元上涨67.4%。十月一日,又突破400美元大关,十月二日,又涨到426美元的新高峰!

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是两种表现形式不同的危机,前者是能源生产跟不上消费的需要,后者是社会产品过剩,超过了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但是归根结底,它们都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的产品。“不足”的危机和“过剩”的危机这两种相反的现象同时存在,正如同“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即所谓“滞胀”)同时存在一样,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越来越复杂和深刻。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的各种“反危机”措施没有消除经济危机这一痼疾。同样,美国政府的能源措施也未能治好能源危机这一顽症。能源危机将继续和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从不同的方面阻碍美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更加复杂化、深刻化。

注

① 《美》《商业周刊》,1979年8月20日

② 根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农业及国内经济学院院长、教授雷伊·科曼特分析:“美国有足够的煤,按照目前的消费速度,最少可以开采800年”。但据另一专家估计为500年。

③ 《美》《石油和天然气》(《Oil and Gas Journal》)杂志,1976年12月27日

④ 《美》《美国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1977年第6期

⑤ 参见卡特总统1979年10月10日在白宫谈美能源问题时的讲话。

⑥ 《美》《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1979年3月19日

⑦ 《英》《经济学家》,1979年8月4日

⑧ 《美》《时代》杂志,1979年9月3日

⑨ 《美》《纽约时报》,1979年7月28日

⑩ 《美》《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1979年9月17日